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陳與義集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陳與義集
上

中華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刺與義

陳 與 義 集

(全二冊)

吳 書 蔭 點校
金 德 厚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1⁵/₈ 印張·354 千字

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8,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497 定價: 2.45 元

詠水仙花書三首

先和

共義上

仙人緗色袞縞衣以褊之青悅絲
婁地獨立東風時吹香洞庭暖玉
影清晝遙萬里北清霄亭二竟何
思唯應園中客能賦會真詩

故宮博物院藏陳與義手書詩稿

前言

陳與義（公元一〇九〇——一一三八），字去非，兩宋之交的杰出詩人。祖籍京兆（今陝西西安），唐僖宗時避難遷於蜀之青神，至其曾祖希亮歷官宋仁宗朝時，始又遷洛，故爲洛陽（今河南洛陽）人。陳與義曾自號簡齋居士，後人又稱他陳簡齋。

陳與義出身於官宦之家，祖父恂爲奉議郎、大理寺丞，父親（名已佚）做過朝請大夫。母親張氏，仁宗時宰相張士遜的孫女。他的外祖父張友正，號存誠子，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陳與義除長於作詩外，還工書善畫。其書法清簡，初規模外祖父家法，晚益變體，姿態橫出，自成一家。他二十四歲那年，登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二一）上舍甲第，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後居母喪，住在汝州，結識了知州葛勝仲。宣和四年（一一二二），由於葛的推薦，陳與義以《墨梅》詩爲皇帝所賞識，擢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宣和五年夏日，他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分韻賦詩，詩成，出示座上，皆詫爲擅場，京師無人不傳寫（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四）。雖然未免有些誇張，但說明他的詩名的確震動一時。就在那一兩年裏，他很快由著作佐郎升遷爲省闕考官、符寶郎。皇帝不僅召對，而且讓他重九預宴朝臣（見本集卷十七《有感再賦》詩：「憶昔甲辰重九日，天恩曾與宴城東。」），諸貴要人也爭與往來。正當春風得意之時，他突然被貶到陳留監酒稅。關於這次遭貶謫的原因，《宋史》本傳無記載，只是他的表姪張嶠在《陳公資政

墓誌銘中作了解釋：「時爲宰相者橫甚，強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爲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當時正是王黼爲相，葛勝仲也在貶黜之列，他不可能不受到牽連。這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使陳與義似夢初醒，發出「三年成一夢，夢破說夢中」（《將赴陳留寄心老》）的無限感慨。自此他沉湎於飲酒賦詩、遊山玩水的生活裏，以排遣心中的抑鬱和不平。

靖康難起，金兵大舉入侵，陳與義自陳留南奔，避亂襄漢，流離湖湘。建炎四年（一一三〇）被召，由湖南武昌啓行，輾轉於廣東、福建，次年夏，抵達紹興，任兵部員外郎。在這五年多的飄泊流離生活中，他目睹了國破家亡的慘狀，被廣大軍民奮勇抗敵的愛國熱情所鼓舞，寫下不少忠憤激越的愛國主義詩篇，使他的作品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紹興二年（一一三二），赴南宋小朝廷的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七年，累官至參知政事。陳與義是一個正直、愛國的士大夫，對抗擊金兵侵略、恢復中原，抱有熱切的希望，因此，在他被召委以重任的時候，是想有一番作爲的。他也曾建議撫問將士，薦拔人才。但時局的動蕩，小朝廷的苟且偷安，排斥忠良，許多愛國名臣如李綱、張浚等，都相繼遭到排擠和打擊。有鑒於此，他擔心位高名顯容易招致大禍，「寵祿既過，則災所由生，尸素已多，則釁乃易會」（張嶠《代參政乞官觀奏劄》）。同時，他又因「早衰多病」，身體勝任不了繁劇的政務，終經五請而罷政。他只做了一年多的參知政事，就辭官回到湖州。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十月二十九日逝世，年四十九。

陳與義的作品大致以靖康元年（一一二六）爲界限，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一個是北宋時期，大多數是抒寫承平時的閒情逸致，以及個人的哀怨和牢騷。後一個是南宋時期，詩人傷時撫事，不少作品寄

託了深厚的家國之感。

南渡之前，陳與義的生活比較安定，由於仕宦家庭的熏陶和周圍環境的影響，他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從少年時代起就胸懷壯志（《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昔吾同年友，壯志各南溟。」），熱衷於功名（《感懷》：「少年爭名翰墨場。」）。但是，他登上仕途以後，只做了幾任不重要的官，並沒有得到重用，盡管後來以《墨梅》詩受知於皇帝，恩寵倍加，名重一時，可是不久就遭到貶黜。因此，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抒寫個人的哀怨和憤懣的。他不滿對自己的冷遇，「四歲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馬帝王州」（《若拙弟說汝州可居已約卜一丘用韻寄元東》）；他厭倦案牘的繁重，「官裏簿書無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對酒》）；他鄙薄功名富貴，「功名忽念我，此心已掃除」（《書懷示友》）；他嚮往歸隱田園，「叔夜本非堪作吏，元龍今悔不求田」（《謹次十七叔去鄭詩韻二章以寄家叔一章以自詠》）；「我策三十六，第一當歸田」（《書懷示友》）。如果說這些詩還僅僅局限於反映個人的遭遇，以及對升沉得失的不滿，有它庸俗的一面，那麼，《書懷示友》第七首，就突破了上述比較狹隘的思想範圍：

仲舒老一經，策世非所長。瓦鼎薦蔬食，但取充飢腸。偉哉賈生書，開闢有耿光。既珍亦可飽，舉俗不見嘗。

詩人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表達了自己對現實的態度。他批評董仲舒老於一經，其《賢良三策》於世無補，實際上是嘲諷當時的理學家空談性命，不切實用。他讚揚和同情賈誼，正是寫出自己的懷才不遇。「舉俗不見嘗」乃是對當時社會的憤怒斥責！

又如《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其一：

巧畫無鹽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姝。縱教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

巧奪天工的畫筆，任憑怎麼塗抹，也不能改變事物的美醜；縱使變白爲黑、顛倒是非，妖冶的桃李在風韻綽約的墨梅面前，依然相形見拙。詩人的寓意是多麼深刻啊！不過，像這樣優秀的作品，在陳與義前期創作裏，畢竟不多。多數詩篇仍然是閑情逸致、流連光景之作。

南渡以後，陳與義在逃難中的第一首詩，是《發商水道中》，標誌着他的創作進入了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到紹興元年（一一三一）這五年之內，這是他飄泊流亡的五年，也是他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不論是作品的數量還是作品的質量，都超過了上一時期，所以劉克莊說：「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後村詩話》前集卷三）至於紹興元年之後，由於政務繁忙，又「數年多病，意緒衰落」，他很少寫詩，而有價值的就更少了。

翻開這一時期的作品，經常會碰到一個「憂」字，如：「去歲重陽已百憂，今年依舊歎羈遊」（《重陽》）；「萬事鄉山路不通，年年佳節百憂中」（《除夜不寐飲酒一杯明日示大光》）；「甲裳無乃重，腐儒故多憂」（《遊董園》）；「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夜賦》）；「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同范直愚單履遊涪溪》），不一而足。陳與義廁身於難民的行列，在長年的流離顛沛中，經歷着深重的民族苦難，他的視野開闊了，思想感情也有顯著的變化。面對着淪入敵手的錦繡河山，而統治者却又懦弱無能，一味苟且偷安，不圖進取，詩人怎麼不憂心忡忡呢？他前期的作品裏，也經常出現「憂飢寒」、「憂冷語」、「憂

網羅」等詞語，那是爲個人的得失憂慮重重，而現在就不僅僅只慨歎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是憂國傷時的思想佔居了主導地位。正是在這種愛國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他才寫出不少沉鬱悲壯、感懷家國的詩篇，成爲那個時代杰出的詩人。

南奔之初，陳與義就非常關切地注視時局的變化，對朝中大臣之間互相傾軋、勾心鬥角，尤爲就心。如《鄧州西軒書事》其六：

楊劉相傾建中亂，不待白首今同歸。只今將相須廉蔭，五月并門未解圍。

太原地屬古并州，故說并門，是北方的重鎮。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十二月，金兵入侵，兵分兩路，一路南攻汴京，一路西圍太原，而太原的存亡直接關係到京師的安危。正當太原被圍吃緊的時候，朝廷「宰相大臣與將帥異謀，朝夕喧爭」（《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二，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監察御史徐應求上書），置國事於不顧。詩人用唐德宗時楊炎和劉晏互相傾軋致亂，最後遭到伏誅的歷史教訓，告誡那些爭私利的宰臣和將領，希望他們像廉頗、藺相如那樣以國家爲重，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宋高宗趙構腐朽無能，在金兵進攻面前束手無策，只知節節敗退、東奔西逃。陳與義對他的逃跑主義行爲深爲不滿，在《雷雨行》、《次韻尹潛感懷》等詩中，以辛辣的筆觸進行了嘲諷。而《傷春》則是這類作品中最有代表的一首：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殘兵敢犯犬羊鋒。

詩中「上都聞戰馬」，謂汴京淪陷。「窮海看飛龍」，指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十二月，金兵過江，攻破臨安、越州（今浙江紹興），宋高宗「航海避兵」。次年二月，金兵攻長沙，向子諲「率軍民死守」，英勇抵抗（見《宋史·高宗紀》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一）。詩人追咎了奸臣的誤國，譴責皇帝的逃竄。所謂「傷春」，實際上是憂國。

陳與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深知「天下方有難，非血誠壯烈不足以解國家之憂」（見本集《跋郭節度父墓誌銘》），所以他對那些忠勇堅貞的愛國志士非常崇敬和熱愛，並寫詩予以鼓勵和頌揚。堅守長沙抗擊金兵的向子諲，字伯共，以直龍圖閣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是一位反對賣國求和的愛國大臣，詩人在《別伯共》、《再別》、《題向伯共過峽圖》等詩中，勉勵他保衛祖國，「柱天勳業須君了」，對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資政殿大學士、京城四壁守禦使劉韜，靖康二年（一一二七）正月使金，招降不屈，自經而死。十年以後，詩人追懷往事，寫下《劉大資挽詞二首》，對劉韜大義凜然的忠烈精神，表示了深切悼念和贊歎：「一代名超古，千年淚染衣。」煌煌中興業，公合冠麒麟。」尤其是「當時如有繼，猶足變危機」二句，慨歎國中無人，是對苟安之徒的強烈譴責。難怪他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滅胡猛士今安在？非復當年單父臺！」（《雨中再賦海山樓詩》）

陳與義還在許多詩中，抒發了對淪陷在敵人鐵蹄下的故鄉的懷念。南渡初期，他就曾在《道中書事》裏寫道：「易破還家夢，難招去國魂。」而這種綿綿鄉思隨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強烈，即使在題畫咏花的詩裏，也不禁流露出來：

分明樓閣是龍門，亦有溪流曲抱村。萬里家山無路入，十年心事與誰論。（《題畫》）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鍾客，獨立東風看牡丹。（《牡丹》）

陳與義在他的詩歌創作中，所表現的這種痛恨金兵侵略、不忘恢復中原的愛國思想感情，固然是那個時期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但也是和歷史上的愛國主義精神一脈相承的。具體地說，就是杜甫對他的影響。他和杜甫所處的時代不相同，但都遭遇到相似的社會大變動，個人的生活道路盡管不一樣，可是都經歷了兵荒馬亂和顛沛流離的痛苦。所以陳與義對杜甫描寫離亂和憂國憂民的詩篇，才有比較深刻的體會，感到以前學習杜詩時忽視了這方面，意味深長地說道：「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避虜入南山》）。對杜詩的認識有了提高以後，他寫出像《巴丘書事》、《登岳陽樓》、《次韻尹潛感懷》、《傷春》、《觀雨》等優秀的詩篇。它們無論是思想風格還是藝術特色，都很像杜詩。因此，楊萬里稱讚他說：「詩風已上少陵壇」（《跋陳簡齋奏草》）。當然，陳與義的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生活，不如杜詩那樣廣泛和深刻，所表達的憂國傷時的思想感情，也不像杜詩那麼深沉和執着。尤其是他只把抗金救國的希望寄託在愛國的文臣武將身上，並且始終抱有「一飯不忘君」的忠君思想，看不到蓬勃興起的人民羣衆的抗戰力量，甚至害怕方臘、鍾相、楊么等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幾首直接關心人民疾苦的詩歌，甚至經常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感傷情緒。

方回編撰《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師道及陳與義爲三宗。這裏免不了有些門戶之見，但陳與義確實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只是他不墨守陳規，能多方面向前人學習，博取衆家之長，然後加

以融會貫通，發展變化，這樣就突破了江西詩派的束縛，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所以元代的吳澄說：「簡齋古體自東坡氏，近體自後山氏，而神化之妙，簡齋自簡齋也。」（《吳文正公全集》卷九《震翁詩序》）

他少年時代，曾向崔德符問作詩的方法，崔告誡他說：「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見徐度《卻掃編》卷中）陳與義能秉承其教，因而他的詩既不淺薄，也沒有「掉書袋子」氣，不像黃山谷那樣奇峭拘硬，艱澀難懂，而是語句明暢，音節瀏亮。經過喪亂之後，詩風變得雄闊而慷慨，沉鬱而洗煉，這在他的律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如《登岳陽樓》：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登臨吳蜀橫分地，徙歎湖山欲暮時。萬里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弔古風霜裏，老木蒼波無限悲！

蒼涼悲壯，猶如杜甫的《登高》。陳與義擅長於繪畫，他的畫雖沒流傳下來，但他的許多題畫詩還保留在集子裏，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繪畫藝術的鑑賞力。他熱愛山石林泉，往往以畫家的眼光觀察自然景物，對它們的變化非常敏感，而且細緻入微，發為詩歌，形象鮮明生動，語言清新自然。如《襄邑道中》：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堤半日風。臥看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

寫出春日行舟時的兩岸風光和悠閑自得的心情。而山行時又別是一番景象：

山空樵斧響，隔嶺有人家。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出山》）

真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爲了寫出詩的意境，不落窠臼，他在遣詞造句時很注意新穎，如同樣是描摹春天景緻，「燕子初歸風不定，桃花欲動雨頻來」（《對酒》）與「高柳光陰初罷絮，嫩鶯毛羽欲成花」（《題東

家壁」不同；同樣是刻畫雨後新晴，「疊雲帶餘憤，遠樹增新綠」（《積雨喜霽》）和「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雨晴》）迥別。寫連綿秋雨，能「一涼恩到骨」（《雨》）；狀傾盆大雨，則「海壓竹枝低復舉」（《觀雨》）。而「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懷天經智老因訪之》），更把客中的閑情和雨中的春色，描繪得詩意盎然，被魏慶之目爲「宋朝警句」（《詩人玉屑》卷三）。陳與義的詩歌比較講究推敲和創新，但有時襲取前人的詞句太多，也是他的毛病，洪邁曾指出他過多用「受」、「覺」二字，「未免頻復」，不如杜詩用這兩個字奇絕（見《容齋四筆》卷七）。這說明他還未完全擺脫江西詩派的餘習。

陳與義的詩名在當時很大：「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有一個叫陳晞顏的，他是周必大的同年學友，特別喜愛陳與義的詩，有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這恐怕在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楊萬里爲他的和詩集寫了序。到宋末元初，由於劉辰翁、方回等人對陳與義的推崇和提倡，學陳詩者越來越多：「自劉會孟（即劉辰翁）的字——筆者注」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爲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程文海《雪樓集》卷十五）

陳與義不僅長於詩，亦工詞，今存《無住詞》一卷。雖然僅有十八首，但都清新可喜，其中比較有名的篇章，自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之後，歷代的詞選都注意選錄。《臨江仙》一詞，寫得委婉奇麗，更是廣爲傳誦：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

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陳與義死後四年，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他的學生周葵得其家所藏詩五百餘首，釐爲十卷，刻於湖州，葛勝仲爲之序。這是《陳與義集》的最早刊本，可惜早就失傳了。葛序僅存於《丹陽集》中，但《簡齋集》各本均不載。宋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胡穉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住詞一卷《脫稿》，旋即梓。宋本原刻舊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後同元刊《陳簡齋詩外集》一起影印，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胡穉生平事蹟不詳，但他距陳與義的時代較近，對詩人的生平事蹟以及往還諸人，都能考其始末，對詩中的典故出處，也作了較詳的注釋。並且還附有年譜，雖然非常簡略，但已勾勒出詩人的生平大概。胡穉還未詳備，疏陋錯誤之處也不少，可是，它爲閱讀或研究陳與義的作品，提供了方便。胡穉《無住詞》，是現存宋人注宋詞之一，就更彌足珍貴了。

《陳簡齋集》，除胡穉三十卷本外，還有《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本。據《甬宋樓藏書志》載，有元、明兩種刻本，但已流到海外。我們所見到的是李盛鐸昔年從東京購得的日本翻刻明嘉靖朝鮮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據李氏題跋，此本「源出宋刊」。它比胡穉本多出《次周漕族人韻》、《水車》、《山居二首》、《拜詔》及《別諸周二首》等七首詩和《書堂石室銘》一篇。除多出篇目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有劉辰翁的評語一百多條，散見於各詩詞句後或篇末；二是刪節胡穉，增添新注。新注有的注明「增注」，有的沒有，它出自何人之手，難以攷訂。但增注或補充胡穉，或訂其訛誤，或評品詩詞，都有一定的見地，可補正胡穉的疏陋和錯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增注引用了胡穉本、武岡本、閩本及簡齋手定本的校勘文字，後三種刊本早就亡佚，幸有此本，我們還能粗知各本的異文。因此，須溪評點本是

胡箋本外又一重要的刊本，所以李盛鐸說：「瞿氏所藏乃宋刊孤本，得此亦彷彿虎賁中郎矣！」

胡箋本和須溪評點本都是編年的，還有一種分體本，即《四庫全書》本，也就是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此本把上述兩本及外集的作品都收錄了，但將注文刪去，只剩下白文。由於清代封建統治者的文化專制主義，爲了避諱，不僅對一些礙眼的字詞，如「胡兒」、「虜」、「狄」等作了改動，而且還刪去了《送大光赴石城》、《傷春》和《次韻謝邢九思》等三首。其它臆改處也不少。

據上述三種版本統計，今存陳與義的作品有：古今體詩六百二十六首；詞十八首；賦三篇；雜文四篇（記、跋各一、銘二）。

我們這次校點整理《陳與義集》，以夏敬觀手校江寧蔣國榜湖上草堂覆刻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胡箋本（包括外集）爲底本（簡稱蔣本、夏校），以日本覆刻明嘉靖朝鮮本《須溪評點簡齋詩集》（簡稱李氏藏本）、武英殿聚珍本（簡稱聚珍本）爲主要校本，還參校了下列各本：

一、北京圖書館藏黃丕烈、趙宗建校跋的元刻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胡學士續添簡齋詩箋正誤一卷年譜一卷》（簡稱黃本）。

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初刻本《簡齋詩集》殘卷（四—七卷，九—十五卷，簡稱明本）。

三、《四部叢刊》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簡稱瞿本）。

四、《四部備要》本《簡齋集》（簡稱備要本）。

五、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汲古閣刻本《無住詞》（見《宋名家詞六十種》，簡稱六十家詞本）。

六、北京大學藏朱祖謀編彊村叢書本《無住詞》（鮑渌欽校影宋鈔胡仲孺箋簡齋集本，簡稱彊村叢書本）。

七、北京圖書館藏宜秋館本《陳簡齋外集》（見《宋人集》，簡稱宜秋館本）。

八、蔣本所附錄的馮煦《校勘記》，我們也有選擇地加以利用（簡稱馮校）；馮煦引莫友芝校記（簡稱馮引莫校）。

在校點過程中，我們將胡箋注文加上注碼，移到正文之後，並將《須溪評點簡齋詩集》中的增注，錄於胡注之後，最後才是校勘記。爲了便於區別，分別在胡箋、增注、校勘記上冠以「箋注」、「增注」、「校記」等字樣。《外集》中的注文也排於正文之後、校記之前。

胡箋引書常有錯誤，如《九章》誤作《九歌》，《莊子·逍遙遊》誤作《莊子·齊物》，杜甫《復愁》誤作《九日》等等，不一而足。凡是我們發現的就加以改正，並寫入校勘記，但無法一一查對原書，肯定還會有遺漏。注文中的脫文誤字，比比皆是，我們認爲個別非出校不可的寫了校記，一般就逕改了。《無住詞》和《外集》的目錄，原在各集之前，現統統移至書前總目中去。目錄部分時有舛誤，爲了使之與正文題目相符，也逕直改正，不再出校記。凡一個標題下有兩首詩以上的，原以「又」字區別，現改爲「其二」、「其三」等小題。

胡箋引書常用簡稱或代稱，現仍照原樣，適當加上書名號。對胡箋注文的標點，只在對話、引用詩文、專有名詞以及容易誤解之處加上引號，一般則不加。